

无论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立新中国后，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都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饮食上决不搞特殊化，坚决反对大吃大喝、奢侈浪费，为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好表率，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条件比革命战争年代要宽裕很多，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如果提出想吃什么，应该能做到。但是从史料看，他依然保持着简单节约的饮食习惯，吃得相当平常。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5年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一家的伙食费我给定的是每天3元。”但是，毛泽东看了后，嫌高了点，经李银桥解释还包括“待客的钱”，他这才提笔写了“照办”二字。保健医生王鹤滨也说：“毛主席不准我们提高伙食标准，对饭菜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他老人家保留着湖南人一般的饮食习惯。”

平时吃饭，四菜一汤。根据多位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毛泽东从来不对饭菜发表意见。

在吃喝用的生活细节上，毛泽东绝不许搞特殊。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用的、花的。但是

毛泽东严于律己反对吃喝风

□ 李晓巧 史拴拴

如果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610元，三年自然灾害他带头将工资降到了三级工资404.80元，其中，每月吃饭开销100元左右，哪怕从南海供应料拿一棵菜也要付钱。

毛泽东的孩子一个星期跟他吃一顿饭，平时吃食堂。遇到外地给毛泽东送来少量土特产，他都叫工作人员送给幼儿园，或者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不把这些东西送给自己的家人。毛泽东请客，除了外宾外，都是用自己的稿费来招待客人，而且都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请客人点一个菜，然后配两个蔬菜，一碗汤。

毛泽东对于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

要吃饭穿衣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吃饭问题，他指出：“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据给毛泽东担任生活管理员达12年之久的吴连登回忆，一次吃饭时，毛主席夹起掉在桌上的饭粒朝嘴里送，他赶忙说：“主席，不要了。”毛泽东马上很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农民吗？农民苦啊，农民不容易啊。我们不能浪费，不是一粒饭的问题，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就是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毛泽东在生活上不仅自奉甚简，带头节约，并且还坚决同大吃大喝行为作斗争，在全党全国倡导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大吃大喝的廉洁风尚。

1948年4月1日，结合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和生产实际，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指出：“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这是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察党当时党政干部中出现大吃大喝苗头，及时向党内公开发出的严正警告。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顺路考察东北哈尔滨、长春、沈阳几处工业基地，受到了地方领导的热烈欢迎，哈尔滨、沈阳两市精心准备丰盛的美味佳肴招待毛泽东一行，留下了毛泽东痛批大吃大喝的故事。在哈尔滨的接待宴上，毛泽东只吃了点蔬菜和米饭，餐后，他严肃地对哈尔滨市领导说：“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面对沈阳更加奢侈的招待宴会，他只是礼节性地陪同客人喝了几口葡萄酒，吃了一点儿青菜，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抽烟。之后，他批评沈阳市的领导：“同志们，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第二天，在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和沈阳市的领导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怒不可遏地批评“吃喝风”。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下，党政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大吃大喝，热衷奢靡生活。1952年，党中央在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毛泽东在1952年1月1日的《元旦祝词》中，将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作为“新开辟的一条战线”，认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害”。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包括大吃大喝、铺张奢靡等浪费行为的痛恨程度之深。

在“三反”期间，处决天津地委、专署负责人刘青山和张子善，就

是因为这两位曾经的革命功臣，进城“掌权”之后，堕落为贪图享乐、大吃大喝，严重贪污浪费，并接受资本家贿赂的“人民的罪人”。“三反”运动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1956年11月15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勤俭建国、反对浪费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毛泽东说：“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可见，作为卓越政治家、开国领袖的毛泽东对于包括大吃大喝在内的浪费问题的一丝不苟的态度、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历史证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和建设时期，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大力提倡推动的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大吃大喝、厉行节约治国举措为政权巩固、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夯实了基础。

（摘自2018年7月26日《群众》）



妇运先驱汤国梨

□ 冯杰



（上接1版）

着眼解决公益诉讼检察实际问题,考量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预期目标

近年来，我国公益诉讼检察全面展开，正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从检察办案实践看，不同程度存在着线索收集难、办案方式滞后、协同指挥不畅、监督管理乏力等问题，制约了这项专门监督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以数据、算法和算力为基础的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已成为公益诉讼检察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路径和动力支持。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应当确立逐层递进、相互关联的预期目标，以回应公益诉讼检察的实践关切。

多渠道收集数据，让线索“自动上门”。能够获取海量数据是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基础。大规模、多样化采集微博、论坛、贴吧、短视频、自媒体等互联网数据，打通对接行政机关数据，深度挖掘“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等检察数据，通过不断优化算法，让批量公益诉讼案件线索自动呈现出来。

自动化对比筛查，使案件“浮出水面”。具备自主智能学习模式是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内在要求。通过系统自动对案源类型、案发时间、涉及区域、行政机关履职情况、危害后果、舆情风险等进行分析研判，赋予不同权重分值，并进行自适应学习，不断增强对数据进行分类、识别、判断的能力，将有价值的案件线索自动筛选出来。

综合性技术支持，为办案“赋能增效”。有效支持办案是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必然要求。针对办案需求，运用信息化手段整合办案资源、配备辅助办案工具，实现共用共享。注重运用无人机、卫星遥感技术、快速检测技术等收集证据。加强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和相关案件自动匹配筛选，提供全方位参考。

全要素动态分析，助决策“耳聪目明”。辅助决策是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重要方向。通过对多元、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厘清关联关系、掌握发展趋势；通过实时监测和动态跟踪各种数据指标的变化，及时掌握办案运行态势，为业务指导和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通过自动汇总分析办案数据，以可视化等方式呈现，直观地理解数据和分析结果，全面增强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精准性和有效性。

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关键在于打造场景齐备、功能强大的数智平台

数智平台即大数据智能化平台，是为集中收集存储、分析处理海量数据而构建的信息化平台。基于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的预期目标，依托检察工作网建成了统一的公益检察数智平台，实现“共享一平台、共用一张

网”。着力打造智能研判辅助办案、类案监督模型超市、专项活动集中展示、办案质效综合分析、融合通信指挥调度五个应用场景，具备线索研判智能化、类案监督模型化、专项监督模块化、态势分析可视化、案件监控全程化、指挥调度一体化等功能。

智能研判辅助办案场景，实现案源数据“一池汇聚”，案件办理得心应手。公益检察数智平台通过履职发现、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互联网舆情、“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随手拍、督察督办六大渠道搜集数据。通过智能检索、知识图谱等辅助工具，筛选案件线索，并通过成案指数体系，借助程序算力实现线索研判全程自动化，做到“沙里淘金”，极大改变了以往实地摸排、肉眼辨识的线索发现模式。通过对接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做到办案闭环管理、流程监控全程化。通过构建知识库，实现办案所需行政主体信息、法律法规规章、相关案例的一键检索。

类案监督模型超市场景，实现监督模型“一键共享”，办案应用精准高效。从推行类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维度，公益检察数智平台将全省自主研发的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择优在模型超市上架，实现一地研发、多地共用，避免重复研发，提高了模型利用效率。模型超市根据应用热度动态调整排名，实时监测监督模型使用情况。

专项活动集中展示场景，公益检察效果形象直观。公益检察数智平台通过自动抓取专项活动相关数据，智能统计大气、水、土壤和生态资源“四个领域”办案数量及成效，进展情况一目了然；对交办督办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实时动态追踪，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运用卫星遥感影像自动解析技术，通过三维地图定位及电子围栏方式，对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防治进行重点动态监控，开启检察公益诉讼办案科技化、精准化监督新模式。

办案质效综合分析场景，实现办案质效分析“一屏展示”，指挥决策科学精细。公益检察数智平台实现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2.0对接，动态、实时更新展示全省公益诉讼立案数、诉前程序数、起诉数、判决数及各领域案件分布情况。以案件、图片、视频等方式展现办案前后的效果比对，做到公益诉讼办案质效可视化。对办案数据、办案成效、效果比对三大主题进行数据综合解构，展示各地办案情况，提高公益诉讼办案数据的穿透性、真实性、全面性，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融合通信指挥调度场景，实现上下联动“一体指挥”，调度指挥便捷顺畅。公益检察数智平台借助融合通信技术，整合移动终端、执法记录仪等多种设备，将办案现场的语音、视频、图像、数据等各种信息回传到平台，可对现场办案人员进行远程指挥、实时调度和决策指导。通过跨层级视频连线，突破以往办案层层听取汇报模式，省市院可对基层院重大案件同步开展会商研判，直接指挥开展调查取证，提升了公益诉讼检察办案

的效率和质量。

以数智平台为依托,持续拓展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

随着公益诉讼数智平台初步建成和投入运行，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取得一系列阶段性进展，办案质效明显提升。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完善拓展大数据智能化在公益诉讼检察领域的持续应用，有利于整体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智平台应用。切实发挥好平台赋能公益诉讼办案的倍增器作用。深入开展培训，让公益诉讼检察人员真正懂操作、能操作，会用、善用数智平台办案。坚持重在应用，强化督导检查，省市检察院常态化开展平台使用情况的检查通报，督促各级检察院应用尽用，确保平台全面发挥作用。持续优化完善，坚持边办案应用、边发现问题、边总结经验，收集一线办案人员意见建议，及时对平台功能进行提升改进，强化机器学习、优化平台算法、提升程序算力，更好服务办案。

整合数据资源。继续拓展信息获取渠道，提升数据来源的广泛性、时效性，探索构建“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公共数据授权使用机制，最大程度减小公共数据使用风险。加快建立公益诉讼检察数据标准，通过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快盘活各类数据资源，让各类数据按内在规律有机联动起来，构建更加多元化、系统化、一体化的公益诉讼法律监督大数据资源体系，促进数据资源的深度融合、有机耦合和有效整合。加大数据信息的挖掘深度，增加数据信息分析维度，切实提高案件线索转化率，为强化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提供更加丰富的线索。

注重高科技融合助力。主动拥抱新技术，积极探索AI、云计算、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在检察办案中的应用，借助新科技新装备的技术优势破解司法办案难题，减轻检察人员事务性工作负担，切实提升办案效率，推动科技与法治融合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加强科技装备应用操作培训，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识别、追溯、取证、评估，发挥快速检测技术方便性、快捷性特点，为线索初查、证据固定提供及时有效的判断依据和导向指引。

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增强数据安全防范意识，把使用数据与保障安全作为并驾齐驱的原则来研究和考虑，严格执行数据安全和保密规定，制定实施周密可靠的数据管理制度，将数据安全贯穿采集、共享、使用、储存全过程。及时开展安全评估，严格落实数据安全工作职责，切实提高技术防御能力，防止数据被非法获取、篡改、泄露或者不当利用，筑牢数据安全“防火墙”。

公益诉讼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个新兴领域，方兴未艾，充满生机与活力。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是数字检察战略实施的一片“蓝海”。我们将脚踏实地、锐意进取，深化理论研究、加强实践探索，拥抱高科技新技术，努力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取得新突破。

（作者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这张照片是1913年6月汤国梨与章太炎的结婚照。

对于这桩婚姻，女方汤国梨事先并不看好，她曾坦言：“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相差15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即剪辮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从上述见识来看，汤国梨并非等闲之辈。武昌起义时，许多省份响应革命，纷纷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偏偏负隅顽抗，江浙一带的仁人志士组织联军攻向南京。汤国梨与多位同学四处奔走，热心组建“女子北伐队”，募得经费5万余元，后因联军攻克南京而作罢。

民国肇始，汤国梨、吴芝瑛、陈撷芬曾联合各界妇女代表给孙中山写信，建议在参议院和国会开会时“为女界预留旁听席及参政席”，希望“中华女子有完全的参

政权”；同时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聘请宋庆龄为名誉社长。孙中山很高兴，回信肯定“女界多才”，承诺“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还专门拨款5000元作为扩充公益之用。

受此鼓舞，各位女杰在上海创办神州女学和《神州女报》，汤国梨既担任教师，又兼任编辑，积极提倡妇女参与政治、谋求平等地位以及经济自立等等，忙得不亦乐乎。

汤国梨与章太炎婚事的介绍人是总统府秘书张通典，其子张昭汉与汤国梨是同学，帮助搭线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结婚当日好不热闹，男女宾客多达2000余人，章太炎即席赋诗曰：“吾生虽糗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

结婚当天，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在临现场贺喜，蔡元培担任证婚人，可见婚礼仪式之隆重非凡。

新婚不及月余，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爆发，皖、粤、闽、湘、川等省及上海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伐袁世凯的行列。章太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执意北上面斥袁世凯，结果遭到长期软禁。汤国梨致信北洋政府国务卿徐世昌：“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艰，发言愈狂。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后来，袁世凯暴毙，章太炎获释回家，不久又参加“护法运动”，此后逐渐闭门谢客，专注研究国学。

1932年1月，日军进犯上海闸北，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第五军奋起抵抗，章太炎、汤国梨夫妇组织义演义卖，收容治愈抗日将士140余人。之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无论声援一二·九运动，还都是奔走营救沈钧儒等爱国“七君

子”，都少不了这对革命伉俪的身影。

章太炎病逝后，汤国梨拒绝给他盖国民党党旗，抗议南京当局的独裁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汪伪政府几次想拉汤国梨下水，都被严词拒绝。有感于强寇入境，汉奸粉墨登场，不少妇女为了保持节操而有投水者，她写了一首《感事》抒发悲愤心情：“纷纷龙血战玄黄，强虏骄淫藐莫当。死节原来臣妾事，独留青史赋红妆。”抗战胜利，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内战，汤国梨担任“中央委员”“国大代表”，处处彰显一代巾帼女杰的绝世风范。

1956年，73岁的汤国梨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来历任民革苏州市委副主委、主委。汤国梨曾在入党申请书上深情写道：“拥护本党党章，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和平解放台湾、建设社会主义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汤国梨晚年当选江苏省人大代表、苏州市人大代表，同时也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政协委员。91岁那年，她写下长诗：

台湾遥望路漫漫，故旧飘零亦老残。
何事有家归未得，鱼书何以报平安。
祖国光辉举世知，领邦节使竞相驰。
辉煌奠定千秋业，半壁江山得几时。
吾生九一今初度，阅尽沧桑几度迁。
余子纷纷零落尽，只留正气在人间。
睦邻爱国为天贵，委婉依人性自羞。
功罪分明千古事，悬崖勒马早回头。

（摘自2024年1月4日《人民政协报》）